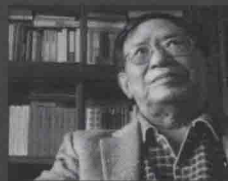


李泽厚研究

第1辑



赵士林 高明◎主编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李泽厚研究

李泽厚文集

李泽厚文集

李泽厚文集

李泽厚文集

李泽厚研究 第1辑

赵士林 高明◎主编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泽厚研究. 第1辑/赵士林, 高明主编.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47-5181-2

I. ①李… II. ①赵… ②高… III. ①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丛刊 IV. ①B83-0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0373 号

策划编辑 初景波 宋 宇
责任编辑 康书民 宋 宇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五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047-5181-2/B·0389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5.5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序

李泽厚的思想学术贡献已成为跨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的丰碑，在当代中国，还找不到一位学者，在哲学、思想史、美学领域均作出创立范式的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美学开宗立派，到晚近关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建构，李泽厚的学术生命总是那样旺盛，文化思考总是那样深邃。更可贵的是，他的思想关注总是敏锐地紧扣时代脉搏，他的问题意识总是那样富于前瞻性。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讨论20—21世纪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都绕不开他，都不能不从他那里获取支援意识。因此，李泽厚研究的日趋活跃，是必然的。中国财富出版社关注学术事业，愿意出版李泽厚研究的文献结集，可谓有眼光，有境界。希望《李泽厚研究》能够为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建设开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赵士林

2014年1月

目 录

李泽厚的中国“度”	1
李泽厚论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4
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	22
生命的同心圆	
——李泽厚《哲学纲要》评注	42
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人类学走向	59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	70
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	99
“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	
——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05
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	
——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	127
中国实践美学 60 年：发展与超越	
——以李泽厚为例	145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	
——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163
走进世界的李泽厚	178
20 世纪 80 年代的李泽厚与“史”：一个观察近年的文学走向的 视角	183

从“巫史传统”到“儒道互补”：中国美学的深层积淀

——以李泽厚“巫史传统说”为中心	210
《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	224
《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李泽厚”条	228
海外书评：李泽厚《华夏美学》英译本书评之一	233
海外书评：李泽厚《华夏美学》英译本书评之二	238

李泽厚的中国“度”

赵汀阳

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李泽厚无可匹敌的学术声望和影响。李泽厚家喻户晓的声望并非来自电视、报纸和网络传播，而是因为其货真价实的思想学术被广泛阅读。这一前传媒时代的成功现象或许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有更多的人追求严肃和深刻思想有关。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均知识总量不及现今，但人们的思想兴趣似乎更强烈，对待思想学术似乎更为认真。如果记忆无误的话，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心中，“真理”是个分量极重的概念，人们追求真理以及盲目追求真理的热情都很高。尽管真正读懂李泽厚的人不是很多，但他的学术著作却畅销数十万册。

从根本上说，李泽厚是中国式哲学家，尽管他对西学有着深入理解。成为中国式哲学家并不在于读破万卷典籍，或者坚决捍卫传统学说，而在于能否以中国思想方法去分析新问题。这就像背了许多棋谱未必能下好棋，学了许多套路未必能打好拳。李泽厚用中国的方法论去分析现实问题，从不泥古，所以有创新，例如历史本体论、情本体等。这里我愿意以“启蒙与救亡”作为例子。

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论点是改革以来对现代性的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反思，但也似乎经常被误解。启蒙与救亡这一解释模式针对的是中国被迫参加现代化游戏的悖论。我猜想，在其背后，李泽厚深受中国的“本末”和“体用”分析模式，以及毛泽东的“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分析法的混合影响。西方的现代化是西方自己开创的文明工程，不存在紧迫压力和外在挑战，所以能够从容地先立其“本”，即科学和

理性的启蒙；先定其“体”，即制度建设，立宪、法治、权利、市场、民主等方面。在“本”“体”的保证下全面致用，疯狂发展经济和技术，夺取世界市场和财富，推行社会各种细节改造。中国是现代化游戏的后来者，一上手就穷于应付，必须救亡以免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得不打乱工程顺序，甚至本末倒置，以用代体，急用图强，试图争得时间和条件以便立本固本。但问题是，本与体的欠缺又是发展的不利条件，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难免自我纠缠，多走弯路。李泽厚所分析的完全是客观形势下的博弈。更重要的是，李泽厚的分析表明，中国要在现代化这个被参加的游戏中获得成功，必须创造中国道路，别无他途。

李泽厚是最早意识到“中国道路”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似乎认为，中国道路虽有不少失误，但主要策略还是基本可取的。需要革命时，革命是对的；需要告别革命时，告别革命也是对的；先发展经济，将来再完善政治，这些都是中国形势下的有效选择。李泽厚老师曾经对我说道，从革命到告别革命，许多人不理解其中逻辑，结果“左派和右派都对他不满意”。但他坚信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更成熟的，因为他是从中国特定形势去分析中国的事情的，而无论左派右派，都是水土不服的西方观点。确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学术仍然有不少“错把他乡当故乡”的观点。

李泽厚自己尤其看重中国的“度”的方法论。这是个非常难以准确表达的问题，我试着对“度方法”给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度，是儒家特别推崇的一个方法论，当然其他各家也重视。“度”大概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可我们却难以恰到好处地说清如何才算“恰到好处”。它大概相当于儒家说的中庸，但中庸不等于适中，而是指——按现代的话说，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对事情的最优做法，或者对问题的最优解决。似乎部分类似于博弈论所说的“均衡解”。如果结合道家的“水”的方法论去理解“度”，也许就更清楚一些。老子推崇能够像水一样处处合适、步步得当的柔软灵活思维，这似乎是在追求“动态均衡”。

也许与对中国方法论的深度把握有关，李泽厚对中国的未来多有独到预见。在公开或私下的预言中，几乎所有中长期（10~20年）的预



言都应验了，令人敬佩。比如，关于改革各个步骤，甚至包括某些具体事件的预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还预言，教育与心理将成为 21 世纪的焦点问题，这也大概为真。还有一些关于“500 年”后的预言（他偏好 500 年这个时间），是否成真就不得而知了。记得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是，李泽厚说，500 年后，英语或许彻底成为世界语，而中国的价值观非常可能成为世界通用价值观。

（为李泽厚八十寿辰而作）

李泽厚论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刘绪源

—

先说一说李泽厚先生的主要哲学贡献。

他研究问题的总思路，大致是这样的：按照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从古代到现代，一步一步弄清楚，从这个思想的生成发展中，他在找一个东西，这就是他所说的积淀。所谓积淀，就是人类从猿到人，人类开始产生感性，产生理性，开始使用和创造工具，发展生产力，人类成为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沉淀下一些东西——这东西不是实物，而主要是“形式”。这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创造和使用工具。因为其他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但是很简单；也会创造工具，但是更简单。它们主要都是靠动物肢体本身的能力，它们都有爪子，能上树，或能长期待在水里；但是人不行，人的特点就是大脑很发达，能够直立行走，能够动脑筋，在这种情况下，人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这成为人最大的特点。在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因为人使用了工具，就有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动物不存在主体性，它是主客不分的，但人不一样。比如，这是我的手，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现在有个手表，手表属于我，但又不是我，这是我使用的工具，它可以离开我。这就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主体性也在这里产生，这就是人对自己的反思和把握，跟动物的区别就这样开始了，积淀就出现了。人在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发展了生产力，而人的生活一定也会起变化。李泽厚认为，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在人类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

中，发展了生产力，然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形成矛盾。马克思的研究是一种人文的研究，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研究。李泽厚说，我的研究跟马克思的研究相比，稍微拐了一个弯，也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我是拐向了人性的研究。外部的社会特点有什么变化，生产力生产关系有什么变化，这是马克思研究的特点；李泽厚认为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研究拐向了另外一边，即主要针对人性的变化，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本身也有变化，他就研究人本身的变化。他认为，个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感觉，一些情感，就成为了感性；但是人与人之间要交流，生产需要合作，相互交流需要有共通的东西，共通的交流的工具，就是语言；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理性，因为理性可以共通，可以概括。这里面就有感性和理性的发展，这就是人在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慢慢改变了自己。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谈：早先的人类社会和我们今天的儿童，相互间有一些相通的东西，这也能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儿童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爱听故事，也爱想象，但过了六岁，他会忘记以前的很多事。是不是先前听过的故事，读过的图画书，还有那些情感、想象，全都白费了？不会。为什么？故事他忘了，但思维形式留下了，思维结构留下了，思维的特点留下了。以后，你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在你逻辑思维生成的时候，在你读书工作成长的过程中，这一切作为结构形式，会起作用。你如果从小不听、不读、不接触、不交流，就会形成另一种思维结构，也会留下来。人在生产发展的中间，人本身的思维结构的产生和改变，这被李泽厚称为文化—心理结构，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这个形成就是积淀。就像淘米水，慢慢积淀下来，会有白白的一层，那是积淀的本义。那么，历史在发展，也开始积淀，积淀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结构，文化—心理结构，人的头脑的结构，思维的特点，所以他的研究的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积淀说”。这本来是在他的美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后来一点点扩大，就运用到他的全部研究中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和他的哲学体系的提出，都是以这个积淀说为“圆心”。他说

他的所有研究，都是一个个“同心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人身上，在人性中，积淀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他研究中国思想史，要看看中国思想发展积淀下了什么东西，中国思维积淀下了什么。这样，我们下面就可以说，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有什么不一样了。

关于20世纪80年代，北大教授黄子平有段话说得很好玩。他说：“80年代初我们北大的学生，每个人每天早晨，头脑里都会有一到两个体系，都是成体系的理论，然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忘了，明天早上又会有新的体系产生。”那是一个疯狂学习的时代，一个创造的时代，大家都想创造理论。但是李泽厚的哲学理论完全不一样，他是进行了长期思考和大量的积累，在作了美学研究和康德哲学的研究，进行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然后，才非常郑重地、一点一点地提出来。他的哲学创造，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积淀说”，另一个就是“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文化—心理结构其实就是“情本体”，它是带感情的，是有情的哲学。

如果要非常简单地说明李泽厚的哲学贡献，我想还是他自己的三句话最精练。第一句是“经验变先验”。我们知道，心理结构中很多东西都是先验的，所谓先验就是经验以前，产生经验以前，接触一个东西以前，头脑中就有的东西，就是先验，经验以后就是后验。康德讲到思维结构，讲到理性，很多东西都是归入先验中去的。为什么人有理性而其他动物没有？人生下来没有理性，长大了就会有，没接触过的事你会用这个方法去思考，这不是有个先验的结构在那里吗？确实，人身上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像数学能力，到一定的年龄就能掌握；语言能力，听你讲讲，他就会说，动物也听你说话，为什么动物不会说，你会说？这些东西跟大脑的思维结构都有关系。那先验到底怎么回事？康德的解释，就是没办法解释，所以就分此岸彼岸，彼岸的东西就是先验的，不可知的，此岸的东西是可以解释的。没办法解释的就变成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上帝给的。这个先验的东西是哲学上最复杂的东西。李泽厚说：我探讨的是先验心理学，而不是休谟那样的经验心理学。他指的就是研究文化—心理结构，大脑的结构一生出来就有，后又在人生中被激活，在一



定的文化中不断生成（族群通过历史，个体通过广义的教育）。这结构是先验的，这是哪里来的？他的观点就是“经验变先验”，先验的东西是经验变的，因为人类在创造和使用工具的长期的历史中间，有大量经验，人类的千秋万代的经验，慢慢地就变成了我们身上的先验的东西，这就是人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人本身的变化，引起了人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先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类历史造成的，是经验造成的。这就是积淀，就是李泽厚要研究的东西。第二句是“历史建理性”。我们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理性也是从历史中来的，这也是积淀说，是在历史过程中，在历史大量反复的实践中，慢慢形成的。第三句是“心理成本体”。哲学的本体是抽象的，那都是逻辑的、理性的，但李泽厚认为心理可以成为本体，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也就是“情本体”。这三句话被李泽厚认为是他哲学中最原创、最重要的东西。应该说，这样的概括是很到位的。

二

下面就讲中西文化区别，中西思维的差异。

因为中国海洋大学是理工科大学，强调科学，我就从一个科学家说起。李泽厚先生举过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大跃进”，也请教了一些科学家，其中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就是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做过一个计算，太阳的能量，在一亩土地的范围内，如果有最好的肥料，最好的气候，在最好的条件下，地里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根据科学的计算，那是可以生产很多很多的，比现在袁隆平的那个产量还要高好多。毛泽东一看非常高兴，中国可以“大跃进”，我们以前太保守了，“大跃进”来了，可以吃饭不要钱，可以十五年赶超英国，当时提出了很多口号。后来就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其实自然灾害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决策的错误恐怕更严重，所以现在已经不说“三年自然灾害”了，我们新闻单位接到过通知，现在叫“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减产，当初却有很多虚报，一些地方

“放卫星”，说粮食产量怎么怎么高，很多领导人都是农民出身的，也有人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种出这么多粮食，但毛泽东很自信，认为有科学家的计算在这儿。这里面就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后来的钱学森先生有很奇怪的变化，我们回忆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人都记得，他非常相信耳朵听字、特异功能之类，他是科学家，却又相信这些，很多人不理解。但他并不是迷信，他当时坚信：人的思维，以及客观事物中，有很多东西是西方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中国思维里就有很多特殊的東西，这些东西我们要发掘。这以后，他还搞了《思维科学》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就是研究各种思维，除了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以外，还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已经是很丰富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他认为除了形象思维还有灵感思维，灵感也很重要，这三大思维，是他个人的一个观点。在灵感思维和形象思维中，体现了钱学森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中的神秘性因素的浓厚兴趣。

李泽厚先生当时写了一篇《庄禅漫叙》，探讨庄子和禅宗，他把中国思想史上的各家各派一家家讨论下来，而庄子和禅宗是非常中国化的，那里有很多神秘主义的东西。钱学森非常感兴趣，专门跑到李泽厚家里去，还给他写信。这个信现在在我手里，这太珍贵了。钱学森在信里就谈了思维方式的问题，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他说李泽厚立了一功，把中国的思维方式提高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世界的思维都是一种贡献。钱学森后来非常重视中国的思维方式，李泽厚认为，他是吸取教训了，因为以前他所用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科学的、逻辑的、计算的、数的方式。李泽厚认为，这样的方式体现的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按照逻辑推理是可能的，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的可能性。但是除了逻辑的可能性，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可能性，是“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在现实中可能是什么样，通过逻辑推理未必能得出同样结论，但这时推理不一定比现实更可靠。比如说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就是逻辑的可能性，说今天可能下雨，然后我带了一把伞，但青岛人不带伞，为什么，他们说，不会下大雨，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是经验性的，不一定经得起逻辑的推敲。但逻辑就一定对吗？



这里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有时逻辑前提本身就有问题。逻辑推理是一种实验室的推断，像钱学森那个计算，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将来，几千年以后或一万年以后，中国的稻田产量有可能达到钱学森的推断，但是那是一种没有任何障碍的完全实验性的纯抽象的推理，用最好的土地，最好的农民，最好的时节，最好的空气条件，各种最好的条件放在一起，才能实现这个逻辑推理，在现实空间根本不可能。而中国人对现实的东西特别了解，李泽厚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思维方式的的不同，也就是“逻辑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区别。

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有过各种说法，很多很多的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始终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比如说中国人爱和平，西方人爱战争（中国的战争也很厉害）；中国人强调综合，西方人强调分析；中国人讲情，西方人讲法……总之各种说法都有。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比较很时髦，大家都在做中西哲学思维对比，后来发现对比都不是很准确，所以大家就都不做了，认为中西方思维的对比大而无当，做起来没什么意思。但李泽厚始终在思考，而且是通过大量细致的研究，一点一点地接近他的结论。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关于“现实的可能性”与“逻辑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而西方哲学是一种“思辨的智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其实从源头上来看，西方哲学是在语言的辩论中产生的，它的产生过程跟西方的政治民主很有关系，在古希腊贵族中，通过选举、投票决定判刑、选出领导，发生战争时也要经过投票。西方议会里一直就有辩论的传统。在辩论的过程中，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不可忘却，即古希腊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都是文盲，《荷马史诗》就是通过口头传播，才得以流传的。而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文字立国与口语立国也会形成不同的政治体制，这个非常奇特，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识字的团体要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要说服别人，思路就要特别清楚（他们没有讲稿），逻辑要分明，煽动性要强，所以很多西方的哲学家都非常擅长言辞，他们在论辩中成长，论辩能力很强。中国则恰恰相反，《论语》

中的“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两种思维非常鲜明的对比。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很强，雅典学院曾有“不懂几何学免入”的禁令，因为平面几何就是一种形式逻辑，不懂形式逻辑的人怎么跟人辩论，怎么讨论问题，怎么推断，怎么搞哲学？西方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起，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科学问题，后来都变成了实证科学，哲学的内容随着科学的推进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科学和哲学是合一的。所以西方的哲学是一种逻辑的推断，是具有论辩色彩的学说。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但李泽厚则认为有。在我和李先生对话的过程中，我也跟他有过交锋。我说中国是“前哲学”，正好用来和西方的“后哲学”接轨。他说你这是贬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前哲学，就是哲学，是跟西方哲学并立的。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吃惊，后来一想，明白了，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创见，他的学说就是这么立起来的。西方的哲学是从论辩中产生的，那么，中国的哲学是从哪里起步的呢？他认为，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诸子百家，那最早的私家论著，就是从《孙子兵法》开始的。兵家要打仗，稍有忽略，便会打败仗，民族就会消亡，这是非常实际的。而且，没有充分的时间让人反复讨论，必须当机立断，抓住要害。所以他提出中国的智慧是“生存的智慧”。他这么一说，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啊！中国的思维里，确实有很多兵家的特点，中国企业家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很多人就延续了兵家传统，当机立断，很有大将风度；而认真真地把问题拿出来思考，反复论辩，这几乎不太有。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下棋。下棋就是兵家对决，只不过是落实到了棋盘上。这是一种变异，但现实中就不是这样思考，我的孩子现在供职的一家德国公司，搞企业咨询，他们有一种工具叫“测定板”，用来检测自己的各类条件，有利的、不利的，都要考虑到。比如，你过去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做过，能给自己打几分？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做过了，相似程度怎么样？相似的事情有没有成功？成功的有几次？你做这个决定的有利条件有哪几项，每项可打几分？这些问题很费时间，但是非常有用。因为这样就把这些问题